
浙江区域经济转型下的就业结构研究

张鑑民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浙江区域经济变革在促进商品或产品市场发展并较快融入新的运行模式的同时,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整体上仍处于艰难的转型时期。据此文章立足于浙江区域改革开放大背景,研究浙江区域就业结构状况及影响因素,并针对如何克服区域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系列化无序和冲突,提出发展策略。

【关键词】浙江; 区域经济; 就业结构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49

【文献标识码】A

浙江就业状况与就业结构分析

浙江就业结构的变化与区域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中,浙江的就业状况一方面取得了骄人成就和进步,出现与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时期所共有的可喜新局面;另一方面浙江的就业却受制于各种因素而尚未顺利转轨,出现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不常有的较高水平失业和就业不足并有的现象。浙江的就业体制和机制,在此复杂背景下所呈现的变革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浙江区域经济的机制长期承受这种巨大就业压力困扰的事实,不仅可以从有关就业的数据中得以说明,而且只要置身于浙江经济活动过程均会有着深切的感受。更何况浙江区域目前面临的失业人员,不仅仅是困难群体的就业再就业、农村转移劳动力尤其是城镇化建设而被征地农民的就业,还有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特别是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浙江省统计局一份名为《2009 年浙江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显示:2009 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规模多达 23.3 万人,比 2008 年增长 8.2%。但因受经济发展趋缓,企业经营困难等影响,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需求明显减少。2009 年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要比往年减少 30% 以上。

其次,浙江就业滞后于整个区域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且部分呈现出未转型状态,也主要表现在就业的部门结构方面。从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来看,1985-2009 年期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虽由 54.9% 下降到 18.3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由 31.7% 和 13.4% 增加到 48.05% 和 33.63%,二者之和已于 1995 年超过了第一产业,但浙江就业结构中仍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状况。从劳动力配置的动态调整结果看,浙江区域仍存在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过慢的现象。

一是过去的十几年中,浙江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已从传统产业向从事边际收益更高的第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并获较大的成就。然而“2000 年人口普查时,从业人员中全省从事第一、二产业的人数相近,均在 35% 左右。至 2001 年,三次产业的

作者简介:张民(1955-),男,四川成都人,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工程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管理工程。

就业结构虽说已是二一三，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成为就业的主体，但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层次明显低于按增值的三次结构”。该现象表明：浙江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应用导致对劳动力需求下降和区域城市化水平滞后的同时，却又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

二是浙江目前第二产业中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和产值增幅远大于劳动就业的增长，已显示出区域第二产业不断的资本深化过程。（即：资本存量的增加快于劳动的增加导致资本深化，在排除技术变革因素下，资本深化将会带来人均产出增长，从而出现对劳动加力吸纳能力的不断减弱进程。）从就业弹性来看，浙江第二产业的产值就业弹性波动很大，且总体呈下降的态势，这表明工业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衰退。

三是浙江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未能发挥出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浙江在国内外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是个体私营经济较为集中、规模经济不显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相对比较优势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这些产业已出现转移和萎缩现象；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有一过程、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也需时日，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需求。

浙江就业瓶颈原因分析

作为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失业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基于此，有关失业问题的原因探索，可收集的文献还是较为丰富的。诸如：裘之论（1998）将失业原因概括为社会因素、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周期和政策因素。高尚全（2000）将此归纳为体制性、结构性、经济周期性失业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全、劳动力供给过剩及制度不配套对劳动力流动和再就业阻滞等方面。顺应这种思路和综合相关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对浙江就业危机原因的分析同样可归纳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等要素。

（一）经济体制改革

从制度层面看，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浙江在实现由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小省向工业经济为主的经济大省跨越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从由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局部突破到全面发展，呈现不断向纵深推进的运行态势。

伴随经济主体的自主权确立，经济主体按效率原则来配置资源，计划体制下的福利性就业和无效的劳动力配置双重作用导致的隐性失业已呈显性化。曾被视为国企经营不善原因之一的用工制度受到重新审视，国企员工下岗加入被称下岗工人的富余劳动者群体，虽说这一群体有部分实现再就业，但还有部分仍处于失业状态。

（二）经济结构调整

目前而言，有统计数据表明：浙江 GDP 构成中的第一产业比重从 1990 年的 24.9% 降低至 2007 年的 5.5%，而同期第一产业的就业劳动力仅由 54.9% 降低为 20.07%，其下降幅度远不如产值比重的下降幅度。

从浙江就业结构性矛盾产生而言，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必然会引起原有劳动力配置的重构，进而导致一些原来的劳动力在岗位匹配上发生困难；另一方面浙江产业结构的演化模式虽可为第一产业转移富裕劳动力成为可能，同时通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浙江的非农产业发展提供出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但这种产业转移的演化模式对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从劳动力配置效率来看，与其它国家相比，浙江的劳动力配置效率也是极其低下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浙江的产业调整

和升级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劳动力配置体制及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等原因，劳动力转型未能跟上产业转型的步伐。产业结构与就业存在着一定的偏离度”。而这种结构性偏差的产生，又主要与浙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换与转换速度相关。或者说：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太快，超越了劳动者技能结构转换的速度及劳动者在产业之间的流动速度和职业流动的速度，从而在短期内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者。

（三）经济增长速度

数据显示，1979-2009 年间，浙江人均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 11.8%，甚至在 2003-2007 年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12.7%，但浙江仍难顺利走出就业困境的阴影。诸如：城镇登记失业率 2000 年为 3.4%，2002 年为 4.0%，2005 年为 3.7%，2009 年为 3.26%，呈现缓慢下降的变动趋势，但年末从业人员数，在 1979-2009 年（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 2.3%。若仅以 2005-2009 五年间（万人）统计，其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3.7%（资料来源为 2010 年浙江统计年鉴）。而且自 20 世纪 90 年代来 GDP 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降低的同时，已存在劳动者失业后重找工作的可能性变小趋向。

（四）人口增长与农村富余劳动力

以劳动力供给数量为计，浙江可算是劳动力数量庞大的省份。“纵观世界发展史，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均经历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历程”，但无论从规模、速度、方式，还是带来社会影响和效果等都无法与浙江进行比较。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尤其是土地承包的实施，已释放数以千万的农村富余劳力，这使原本已经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更为明显。资料显示，2006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 4980 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为 3918.4 万人，扣除不计入劳动力资源的人数，年末全省劳动力资源（16 岁以上有劳动能力）总数为 3733.8 万人，经济活动人口（可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总量）为 3022.1 万人，全社会就业人员为 3172 万人，比 1978 年增加了 1377 万人，增长幅度为 76.7%。而 2009 年从业人员为 3591 万，比 1978 年增加了 1797 万人，增幅高达 100.1%。

缓解浙江就业危机战略举措

（一）把握产业结构转换与劳动力需求关系

首先，劳动力需求作为一种引致需求，它的增长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浙江快速的经济增长为就业需求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数字”的确是往下降，或者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的就业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就业增长变化中经济结构的因素，仍在发挥主导作用。数据表明：2003 年至 2007 年 9 月，全省共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306.3 万，而同期的 5 年，全省共新增就业岗位高达 322.54 万人。

其次，劳动力需求作为一种派生需求，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产业结构和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结构。鉴于浙江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远大于第一产业，就业结构的滞后性较为突出，浙江要完成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及工业服务业转换和由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转换，在其演进过程中，注重和克服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特征，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扩张不足弊端，最大限度地改善劳动需求结构。

（二）重构以市场主导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

鉴于劳动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过程的复杂性，劳动者就业动机及劳动力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间的复杂替代关系，现阶段人们无法设计一套完善的规则来对劳动者行为进行准确的预测和控制。在此情况下，尊重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规律，减少过程干预，市场机制则成为最为理想的选择。另外，劳动力资源作为特殊资源，而市场机制本身因自身缺陷而不具备实现诸如：公平就业，弱势群体保护等多元目标的功能，因此，借助于政府之力以确保各种目标间协调，是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得

以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三）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并将就业增长作为区域宏观政策体系的重心

就业政策作为劳动力市场干预手段，需要切合浙江区域特定的宏观环境，并伴随区域经济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与转型。

宏观层面上，省政府应根据浙江当前的实际状况，在制定宏观经济决策中，不仅要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和经济运行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就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及经济增长方式和速度确定等重大决策活动中，要充分考虑各项措施的就业效应，并将能否促进就业增长作为决策的基本原则。

微观层面上，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所包括的内容有：保持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拉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态势。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第三产业和非公经济，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强化职业教育功能，缓解和克服新的劳动群体对就业市场的冲击。通过就业服务和培训，促进劳动力市场供求之间的合理匹配。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修复劳动力市场功能的缺陷，消除就业歧视等。

总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寻求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浙江社会和谐发展的最高层次，同时也是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 陆立军等. 浙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M]. 人民出版社，2007
2. 刘亭等. 实力浙江—打造产业新优劣 [M].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3. 徐林清.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研究 [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 杨建华. 2008 年浙江发展报告 [M]. 杭州出版社，2008
5. 邓伟根. 产业转变：经验、问题与策略 [M].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6. 浙江省劳动保障科学院. 浙江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 2008 [M].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